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6年第十期（总第61期）

抗战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宣传与中国主权

——战争信息署的士气动员与心理战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抗战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宣传与中国主权

——战争信息署的士气动员与心理战^①

作者:马修·约翰逊

译者:程早霞 黄子桐

编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同时也见证了现代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宣传战。战争期间,美军构建了一个从欧洲到太平洋地区的庞大信息网。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加强了在华日占区及中国抗战后方的宣传活动,而这些行动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战争信息署。战

^①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劳威尔·托马斯西藏之旅与美国的西藏话语研究》(14AGJ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译者简介:程早霞(1965-),女,黑龙江省伊春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凯斯西储大学访问学者,黄子桐(1997-),男,广东省汕头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作者简介:马修·约翰逊(Matthew D. Johnson)是美国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东亚研究所主任、历史系副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组”(The PRC History Group)(prchistory.org)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百姓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高潮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一书的联合主编。研究领域包括:宣传、媒体、中国政治经济与美中关系。联系方式:johnsonm@grinnell.edu。本研究主要是在马里兰的大学公园国家档案馆进行的,并首次于2009年4月在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举办的关于欧洲、意大利和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发表。

文献来源:Matthew D. Johnson, Propaganda and Sovereignty in Wartime China: Morale Oper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under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5, Special Issue 02, March 2011, pp. 303-344.

争信息署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中国分布最广泛的宣传与情报组织之一。它作为美国情报机构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宣传分支机构,在1945年前是美国最大、也是政府机构中在海外信息领域诸多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机构,它以一个战前起源的庞大信息结构来维持国内和国际支持。普通民众成为信息、宣传战乃至心灵胁迫的目标。自1942年以来,战争信息署在中国的重庆、成都、昆明、延安的工作站采用一切办法构建了一个清晰、可信的美国战争目标图画,呼吁中国民众参与这场战争;通过在日本国内制造混乱、疑惑和不满削弱其战时生产;通过促进被占领国家工人及居民的不合作与被动破坏活动,扰乱日本对占领国为进行战争供给而进行的生产的剥削;通过敦促日本劳动力逃离陆海军队阻碍日本军队在占领国的军事行动;诱导部分日本军队投降,煽动部分地方居民进行破坏与抵抗活动;削弱日本军队的士气及战斗精神等。战争信息署还有一个几乎不被人察觉却至为重要的功能,就是建立与战争相关联的实现更广泛目的的沟通管道,如情报外交、传递情报与编码信息等。战争信息署这些具有全球化特质的宣传与情报活动又在某种意义上严重损害了民族国家的稳定性与忍耐力,有时甚至破坏了国家主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虽然抗日战争产生巨大破坏,但它同时也是国际传播的转折点。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主导了信息传播。在二战信息宣传战的顶峰时期,360台无线发送器在50多个国家以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每分钟发送2000多个单词。从某种程度来说,二战引领了一个宣传与信息的新时代。美国学者马修·约翰逊运用翔实的历史档案资料,对战争信息署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影响进行了深入阐述,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在过去被历史学家忽略但至今仍对国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1937 - 1945),美国加强了在日本军事占领区及自由中国的宣传活动。这些行动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战争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 OWI)。本文即分析战争信息署作为美国全力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机构,特别是其海外部,如何对东亚普通民众及战斗人员施加影响。其主要观点是:

美国的宣传机构与宣传人员在影响中国战争进程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些机构中的亚洲人及亚洲人的后裔在战时远东地区共同采取行动推

进美国目标的实现；

美中两国政府在心理战领域有着零星的合作。但在控制权方面的冲突却削弱或者说是限制了这些合作。

尽管有这些缺陷,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宣传机构(包括战争信息署及国务院所属的一些机构)相对来说还是拓展了其行动能力,并在1945 - 1949年间的内战中继续了其行动。

至1945年,宣传已经成为一种既面向盟国民众又面向敌人的行动。这些行动得益于20世纪早期的通信革命,由战后秩序的新设计师进行设计与控制。

导言

战争信息署是太平洋战争时期(1941 - 1945)在战时中国分布最广泛的宣传与情报组织之一。起初战争信息署作为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 OSS)(对它的研究较为详尽)的宣传分支机构,其正式的任务是在美国及美国的军事控制区发布信息^①。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海外机构变成

^① 战争信息署(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 OWI)成立于1942年7月13日。它的海外分支机构的核心是战略情报局(OSS)的前身——情报协调局的信息服务部(Information Serv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 - COI)。可参见 Hawkins, Jr., L. and Pettee, G. (1943). OWI - Organisation and Problem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 1, 15 - 33; Thompson, C. (1948). *Overseas Information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Bishop, R. (1966).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inkler, A. (1978). *The Politics of Propaganda: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2 - 1945*,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On the OSS see Caldwell, O. (1972). *A Secret War: Americans in China, 1944 - 1945*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Smith, R. (1972).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Intelligence Agen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Yu, M. (1996).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a Cold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Hixson, W. (1997).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61*,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Dizard, W. (2004). *Inventing Public Diplomacy: The Story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Lynne Rienner, Boulder; Guo, Y. (2003). 'Jianxi Lengzhanchuqi Meiguozhengfuduiwaixuanhuan de zhuanxing', *Dongnanyanjiu*, 3, 33 - 37; Guo, Y. (2004). 'Cong guojixinwenzhudao Meiguoxinwenzhu—Meiguoduiwaixuanhuanjigou de yanbian', *Dongnanyanjiu*, 5, 58 - 62; Osgood, K. (2006).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Lawrence; Cull, N. (2008).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了一个分布广泛的专注于控制大众的官僚机构。即便是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也认为它对外国政治进程具有危险性影响。^①

在1945年以前,战争信息署是最大、也是政府机构中在海外信息领域诸多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体现了美国行政机构广泛努力的一个部分,它以一个战前起源的庞大信息组织来维持国内和国际支持,其时全球冲突的代价已越来越大。在中国以及更广泛的远东战区,战争信息署(基地在旧金山)的影响首先体现于它在广播事业方面的努力,将战争宣传计划传送至亚洲战区。^②至战争结束时,战争信息署的海外分支机构中国分部可能已经控制了分布于从重庆、成都到昆明,直至延安的日益广大的情报网络。

由于与如此众多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连,战争信息署海外分支机构是抗战(1937-1945年)中值得书写的内容,并可从中捕捉到由于全面战争导致的巨大文化变化及群众动员。这个机构之所以全然在历史叙述中缺失,一个原因是,它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把中国看作为一个整体。这是与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主流叙事不相适宜的。战争信息署的工作无助于中国的文化统一,也无助于知识分子的大众文化政治化,不管这些知识分子是同情共产党领导的战争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战争。^③虽然,他们或许在战争中起到了激励人民的作用,或者其在反日心理战计划的实施上如此。战争信息署的政策反应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某些情形下却疏远了美国的中国盟友。除了一些人对战时军事行动与情报感兴趣外,马里兰大学公园国家档案馆所藏战争信息署档案没能引起东亚研究专家的太多关注。最近,学者们愿意拓展研究聚焦点,开始关注战时经历更广泛的领域,而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扩散。他们发现由汪精卫领导的亲日“再组国民党政府”(Reorganised Nationalist Government)以及战争初期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战线进行的

① Hawkins and Pettee, 'OWI', p. 17.

② Yu, *The Dragon's War*, p. 156.

③ 参见 Hung, C. (1994).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 - 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宣传活动的重要性。^① 日本人在中国北部及东部所进行的宣传或者称“思想战”也是力图赢得中国人民,使中国人的思想远离重庆和延安政府。^② 军事行动催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忠诚竞争。

在许多方面,中国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二战见证了现代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宣传战。^③ 普通民众成为信息、宣传战乃至心灵胁迫的目标。大众传播技术(电影、广播和出版物)、机构形式(信息办公室和宣传部门)、审查制度使得政治组织的主张、行为似乎在更大规模的传播上具有可行性。对于中国来说,正如大量文献所记载的那样,战争的到来助长了对蒋的中华民国主权的侵蚀,其结果是,从前由蒋及其将领控制的中国领土突然对无数的政府与国际组织开放了,由此,这些政府和组织被卷入到全球争夺的角斗场。^④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加入到正在进行的中国抗战,并无可避免地伴有宣传,这种宣传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如“士气动员”。当目标指向联盟时谓“信息”,当针对敌国民众及战斗人员时称为“心理战”,之前学界对战时美国致力于转变中国精神领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聚焦

① 参见 Zhang, Q. and Qi, R. (1990). ‘Jian lun Wang weijituan de wenhuaxuanchuan’ [Brief Consideration of the Cultural Propaganda of the Illegitimate Wang (Jingwei) Clique], *Minguo-dang’ an* [Republican Archives], 3; Guo, G. and Tao, Q. (2003), ‘RiweizaiHuabeixinwentongzhishulie’ [Description of the Illegitimate Japanese (Government) News Control in North China], *Minguo-dang’ an*, 4. On Communist – Nationalist united front propaganda efforts see (1990) ‘Di san ting zuzhijigouyuganbuyilan’ [An Overview of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hird Office Organisation, Institutions, and Personnel], *Wuhan wenshiziliao*, 3; (1990) ‘Di san ting zai Wuhan huodong-gaikuang (jielu)’ [General Conditions of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hird Office’s Activities in Wuhan – Notes], *Wuhan wenshiziliao*, 3; MacKinnon, S. (2008). *Wuhan, 1938: War,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② Kushner, B. (2006). *The Thought War: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University of Hawaii’ i Press, Honolulu. Similar efforts were carried out, with greater demonstrable success, amongst Mongols banners in the provinces of Rehe, Chaha’ er, and Suiyuan.

③ Taylor, P. (2003). *Munitions of the Mind: A History of Propaganda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Present Day*, 3rd e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p. 208.

④ Thompson, *Overseas Information Service*, p. 17.

于文化事务、教育交流及这些计划与美国远东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民主及政治现代化之间的关系。^① 但是人们承认,文化项目与即时美国的战争目标“提振中国士气”相重叠,因而人们较少关注宣传。从这个早期的视角来看,最初将文化与外交政策目标分离开来的铜墙铁壁遭遇侵蚀是战争的一个结果,而非美国外交政策的已有特性,尤其不是 1941 年 12 月可以观察到的中美关系的特征。1941 年 12 月美国承诺加入中国抗战与最终彻底击败日本帝国是相关联的。^②

相比之下,战争信息署的档案记录表明,美国在中国的宣传工作颇具规模,大概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是从美国视角来看这场战争,也因为中国是一个重要战区,动员盟国、击败敌军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以至于不能委任外国政府。在麦克拉肯·费希尔(MacCracken ‘Mac’ Fisher)的领导下,战争信息署的海外分支机构中国分部成为中国境内重庆政府控制的“自由中国”地区最丰富的宣传源(the most prolific sources of propaganda)。自 1942 年以来,战争信息署在重庆、成都、昆明、延安的工作站采用一切办法构建了一个清晰、可信的美国战争目标图画,呼吁中国民众参与这场战争。在战争信息署工作的很多人都是中国人。但心理战及情报搜集却是依靠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nisei - 第二代日裔美国人)、日本战俘(Japanese Prisoners - of - War_ POWs)、朝鲜流亡者、中央军情报员、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们来制定“白区政策”,这种具有美国特质的宣传意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赢得战争:

削弱日本军队的士气及战斗精神;削弱日本民众的斗志;通过在日本国内制造混乱、疑惑和不满削弱战时生产工作;通过促进被占领国家工人及居民的不合作与被动破坏活动,扰乱日本对占领国为进行战争供给而进行的生产剥削;通过敦促日本劳动力逃离陆海军队阻碍日本军队在占领国的军

^① 参见 Fairbank, W. (1976).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 - 1949*,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Ninkovich, F. (1980). 'Cultural Relations and American China Policy, 1942 - 194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9:3; Yuan. Z. and Elliker, C. (1997). 'From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ooks for China Programs during World War II', *Libraries and Culture*, 32, 191 - 226.

^② Ninkovich, 'Cultural Relations', p. 495.

事行动;诱导部分日本军队投降,煽动部分地方居民进行破坏与抵抗活动。^①

虽然有一些人会反对用如同文化与教育项目所用的语言那样来描述这些目标,但对于战争信息署的决策者和执行人而言这种逻辑无可回避——信息(information)和态度(attitudes)是广泛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因素。^②如此,就要使之转换与美国的战时目标及远东政策相一致。

与《现代亚洲研究》这个特刊的主题相一致,研究战争信息署在中国活动的目的就是要阐明非中国人的政府及机构在抗战中的生活经历与文化体验有多么的重要。第二点,但也是相关的,是要关注这样的事实,即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及美国的战争参与人共同工作击败了日本的侵略。和日本帝国一样,抗战来自于多种族的合作网,也不能排除内斗和胁迫。由于东亚史研究往往以国家与地区为中心,对于外国卷入战时动员与思想战的深度的探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诚如外交史学家阿基拉·伊里耶(Akira Iriye)阐释的那样:

自19世纪历史研究成为一个学科以来,国家的历史一直是主要的学术范畴。但历史学家在重新定义国家和历史的概念过程中,正在日益关注跨国国家边界的事态发展及其主题。这种现象部分归因于通常所说的全球化——全球化严重地损害了民族国家的稳定性与忍耐力。经济、社会、文化等跨国力量突破了国家边界,有时甚至破坏了国家主权。^③

战争信息署不是一个跨国机构,但是一个具有国际业务的国家政策工具。第二次现代中日战争在危害稳定、甚至破坏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这些都未能展现出来。同时,伊里耶提请注意为何民族国家历史

^① F. McCracken Fisher, 'Notes 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the China Theatre' (November 1944), 190/8/27/3-4, RG226, p. 1.

^② 参见 Simpson, C. (1994).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Gilmore, A. (1998). *You Can't Fight Tanks with Bayonets: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the Japanese Army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incoln and London.

^③ Iriye, A. (2004). 'Transnational History',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3: 2, 211-22.

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即:比如在发生战争这样极其不稳定的情形下,其他力量如跨国的、国际性的或潜在的入侵势力可能会涌入。

在华战争信息署

从广义上讲,战争信息署海外分支机构代表了战时宣传机构的国际羽翼,这些宣传机构源自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学术界、新闻人、广告商及国家的民意研究与持续合作。^① 战争信息署海外分支机构的活动包括对外信息传播、确保对美国的敌人心理战的胜利。^② 战争信息署的宣传资料来自于非英语专家团队。传递方式包括空投传单、无线广播及视觉媒体如电影、幻灯片和图片。^③ 战争信息署还有一个几乎不被人察觉到却至为重要的功能,即建立与战争相关联的实现更广泛目的的沟通管道,如情报外交、传递情报与编码信息等。美国驻重庆使馆有自己的文化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通过中国的大学进行教育与科学价值输送,派出精明的指导战争的领导人。但战争信息署的活动却包括传递战争情报、具有宣传价值的时论,目的是影响中国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层面。^④ 换言之,战争信息署具有群众组织的诸多功能。仅就中国而言,其驻华机构准备的材料有中文、日文和朝文。此外战争信息署还具有灵活性,具有美国东亚政策代理的影响力。

虽然在华盛顿战争信息署的职位是文职和军人都有出任,但是其海外机构中国分部在其存续期间大部分时间是由战区指挥官史迪威将军(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直接领导。实际上中国分部的几个工作站都参与了每日的士气动员与心理战工作。1941年12月17日,美国新闻署重庆办公

①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pp. 15 - 22.

② Childs, H. (1943). Public Information and Opin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7: 1, 60.

③ 参见 Barnes, J. (1943). Fighting with Information: OWI Overseas,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 1, 34 - 45.

④ Memorandum (1942). Liaison betwee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other Agencie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15 July, 1942,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p. 719.

室的负责人费希尔 (F. McCracken Fisher) 就被之后的战略情报局局长约翰·马格鲁德准将 (John Magruder) 选中做先锋从事实现美国战争目标的“反宣传工作”。^① 仅两天的时间, 费希尔就收到了位于旧金山的战争信息署太平洋局发来的每日新闻报告, 并指示将这些材料分发给在重庆的报纸和广播。

表 1 战争信息署中国工作站^②

地点	第一负责人	启动日期	关闭日期
成都	约翰·福斯特 (John Foster)	1944 年 7 月 1 日	
重庆	麦克拉肯·费希尔 (F. McCracken Fisher)	1941 年 12 月 31 日	
昆明 (战争信息署前哨基地)	詹姆斯·伯克 (James C. Burke)	1943 年 8 月	
昆明 (心理战单位)	詹姆斯·斯图尔特 (James Stewart)	1944 年 9 月	
桂林	格雷姆·佩克 (Graham Peck)	1943 年 8 月	1944 年 6 月
延安			

缩微胶片、杂志和报纸接踵而至, 由此建立了一个以维持中国人斗志为目的的中美之间的直接信息管道。战争信息署公开讲是一个新闻社, 从事各种各样的媒体运营, 但是战争信息署的网络设备却是由美军的信号公司提供的, 它代表美国政府所进行的活动及所从事的战时工作要比其中文字“美国新闻处” (American Information Service - AIS) 范围广泛得多。^③ 由于美国越来越多地卷入抗战, 战争信息署在中国的规模也随之急剧扩展。到战争结束时, 中国分部保留有重庆、成都、延安和昆明工作站。在日本军队不断的军事压力下, 另一个工作站桂林工作站在 1944 年关闭。(见

^① Overseas Branch, Pacific Operations, Office of Deputy Director draft historical report, n. d. [1944], 350/71/16/3, RG208, p. 9.

^② RG 208, 350/71/14/4.

^③ Minister - Counsellor of Embassy in China (Clark) to Secretary of State, 17 June, 1949,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I)*, p. 1091; Memorandum by the Chargé in China (Vincent), 23 April, 1943,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 847.

图表 1)

到 1942 年 7 月,战争信息署的活动既包括公开的、与大使馆相关联的工作,也从事秘密的情报活动。华盛顿和纽约的战争信息署办公室提供新闻稿、演讲稿、地图、录音、附加情报资料及美国政府其他部门通过电传、短波、无线电报获得的公告等。^① 重庆工作站负责分发有关当前新闻与民意的美国缩微胶片、杂志给中国的报纸及其他新闻机构。^② 战争信息署还负责分发其他媒质包括与军队有关的幻灯片、电影(比如新闻短片和战争图片)。由旧金山发送到重庆的短波广播节目再用中波重播。美国制作的新闻要通过电报重新传送给中国报社,或者通过中国工作站工作人员网与新闻界沟通传送。除了这些信息活动之外,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还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再转发给主要从事广播和新闻监督的美国军队。中国分部的各个工作站还搜集以重庆为基地的外国流亡政府的信息——朝鲜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华盛顿也这么做。另外一个重要的情报功能是将心理战材料及相关研究发送给其他美军部队。^③ 自 1944 年以来,昆明工作站就在心理战方面扮演了一个著名的活跃角色。^④ 这些活动主要是由第 14 空军大队和第 20 轰炸机司令部通过在日本后方空投传单的形式进行,来自美国西部(旧金山的安克拉治)和太平洋岛屿的广播在心理战行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战争信息署中国工作站单独制作了大约 40 - 50 份的日文、中文、法

① Overseas Branch, Pacific Operations, Office of Deputy Director draft historical report, n. d. [1944], 350/71/16/3, RG208, p. 4.

② Memorandum, 'Liaison betwee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other Agencie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15 July, 1942,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p. 720. In contrast,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 engaged primarily in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and learned journals, and specialist publications in keeping with the US programme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③ Memorandum, 'History of Pacific Section, Overseas OWI, Washington', 20 March, 1944, 350/71/16/3, RG208, p. 6.

④ 参见 Cai, L. (2001). 'Wo zai Meiguoxinwenchu de dixiadouzheng' [My Underground Struggle in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Office], *Fujian dang shiyuekan* [Fujian Party History Monthly], 1, 32 - 33. A systematic chronology of OWI activities within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语、安南语、泰国语和朝鲜语传单，……一周一份中文图画新闻传单，两周一份法文和安南语图画新闻传单。^① 作为国务院任命的中缅印战区司令的政治顾问，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和外交官谢伟思(John F. Service)负责监督心理战材料的制作，这和美军先锋梯队的军情部 G-2 所做的工作一样。^②

和海外局及其中国分部一样，战争信息署太平洋局在美国向中国渗透的宣传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这个局的总部在旧金山，但它的短波广播向太平洋地区发送 22 种语言的节目，另有一个单独的总部在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Anchorage)的广播站负责军队新闻和心理战。1942 年 12 月，著名欧亚问题研究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辞去了蒋介石顾问的职务，成为战争信息署太平洋局局长和太平洋地区政策应用副主任^③。战争期间太平洋局有 400 多个工作人员，他们遵照华盛顿的指令在制作新闻内容和监督分发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④ 拉铁摩尔在中央情报组(Central Intelligence Panel)的代表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负责协调华盛顿在远东地区的所有计划和情报事宜。当其海外分支机构在 1943 年 2 月 19 日重组时，泰勒被任命为第七战区(Region VII)(中国、日本、印尼和菲律宾)的负责人，拉铁摩尔则是海外计划局(Overseas Planning Board)的成员。1942 年这个机构进一步重组之后，拉铁摩尔就负责监管所有在中国的反日宣传

① ‘Notes 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China’, F. McCracken Fisher, Chief, China Division, OWI, n. d. (4 November, 1944), 190/8/27/3-4, RG226, p. 1.

② On Davies and Service see, respectively, Davies Jr., J. (1972). *Dragon By the Tail: American, British, 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W. 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Service, J. and Esherick, J. (1974).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Random House, New York.

③ 参见 Newman, R. (1992).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98-107.

④ 参见 Cruickshank, C. (1977). *The Fourth Arm: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38-1945*, Davis-Poynter, London, p. 38. H. Preston Peters (OWI Outpost Manager, Area III) to Edward Barrett (OWI Overseas Branch), ‘Report on Trip to London, China, and India’, (24 January, 1945), 350/71/16/4, RG 206, p. 2.

活动,泰勒则成为太平洋局副局长助理。^①

战争信息署的起源、设想与目标

战争信息署(OWI)和更广为人知的战略情报局(OSS)一样,都源自于情报协调局(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 - COI),1941年7月11日由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建立,由“野小子比尔”多诺万(William Joseph ‘Wild Bill’ Donovan)领导。战争信息署和战略情报局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负有“通过黑色宣传手段(非美国特质)”来影响“敌方思想”的职责,所谓黑色宣传即表现出这些信息来自于敌军内部。这两个机构在职责分工上的差异也被中国战区司令保留下来。^②与情报协调局类似,战略情报局被模糊不清地赋以掌管全世界的情报收集和海外宣传工作职责。后者的特工经常以“文化参赞”之名附属于美国的外交机构。因此,战略情报局便与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务院产生了冲突——他们毫不欢迎情报采集和外交进程中的新“入侵者”。于1942年4月成立的中美合作所(SACO)终于为战略情报局确立了一个清晰的角色——尽管处于军统头子戴笠的监管下。战略情报局远东协调员的职位由“玛丽”迈尔斯(Milton ‘Mary’ Miles)暂时担任。^③当战略情报局与军统头子戴笠将军间难以消除的误解成为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在中国开展情报活动这段历史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时,战争信息署却在这场争夺美国军方资助的跨机构竞争中“占得先机”。^④

战争信息署中国政策一个最为持久的特征是在制造宣传材料的过程中努力吸收地区专家和语言学家的智慧。生于英国的战争信息署远东地区副主任、中国史学家泰勒(George Taylor)显然对美军宣传单的粗制滥造感到震惊,并试图通过招募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其他日本专家学者来改变这

① 太平洋行动副主任办公室负责监督战争信息署的反日宣传战及其在华的情报活动。

② Smith, OSS, pp12 - 13; ‘Second Draft, China Theater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rective’, (9 February, 1945), 190/8/27/3 - 4, RG226, pp. 1 - 2.

③ Wakeman Jr., F. (2003).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p. 287.

④ Smith, OSS; Yu, OSS in China, pp. 146 - 147.

一局面。^① 被泰勒招募来的还有哈佛大学的中国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② 另外,位于华盛顿的海外分部办公室在中国和日本本土“战时新闻管制”、“被敌军占领”区域进行的士气鼓舞行动、心理战及其他的信息传播活动中掌控全局,战争信息署的中国分部需接受它的指示。^③ 为避免疏远其亚洲盟友,在进行上述活动时,战争信息署的宣传战专家们特意避免了使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措辞——比如“土著”和“黄种人”。^④

但战争信息署在中国的行动以及相关联的上级指示,还是明显地暴露出对蒋介石和重庆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战争后期费正清把在重庆的国民党描述成“专制独裁”程度“与共产党几乎无异”的政党。他还警告称,不应让蒋介石“看到任何显示美国会无条件支持他的迹象”。^⑤ 相反,战争信息

^① Price, D. (2002). Lessons from Second World War anthropology: Peripheral, persuasive, and ignored contributions, *Anthropology Today*, 18:3, 14 - 20. 泰勒领导的外国士气分析部(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成功塑造了与敌人斗争的战士们在精神与文化上的崇高形象,其中的一些研究成为了以下著作的基础:Ruth Benedict's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enedict, R. (2005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Houghton Mifflin, New York.

^② 参见 Fairbank, J. (1982). *Chinabound: A Fifty - Year Memoir*, Harper and Row, New York. Prior to joining the OWI, Taylor was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另参见 Minear, R. (1980). 'Cultural Perception and World War II: American Japanists of the 1940s and Their Images of Jap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4:4, 555 - 580.

^③ Overseas Branch, Pacific Operations, Office of Deputy Director draft historical report, n. d. (1944), p. 1. 相应地,OWI的活动则基于来自自由OWI、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陆军部与海军部(War and Navy Departments)和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等的代表组成的海外规划委员会(Overseas Planning Board)的指示。

^④ 'OWI in the Far East', 350/71/16/4, RG208, p. 33. 在 Dower, J. (1986). *War Without Mercy*,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中分析的那种国内宣传和军事宣传与美国在太平洋和中缅印战区的信息与军事情报行动中散布的宣传材料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所在。Gilmore, You Can't Fight Tanks with Bayonets. 中也提出了认可道尔结论的相似论述。至于对战争时期种族歧视思想遍布美国的观念的外交政策焦虑,参见 Hart, J. (2004). *Making Democracy Safe for the World: Race, Propagand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3:1, 49 - 84.

^⑤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ffice Memorandum, 9 March, 1945, 350/71/14/4, RG 208.

署国际工作的目标是要让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个“尽可能有用而乐于合作的盟友”。但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美国需要解决这样的障碍:

“冷漠、自满、认为战争即使没有中国更进一步的参与也能获胜;不愿在中国已展示出卓越能力的游击战中投入精力;对中国的战争能力持有脱离现实的空想。”^①

美国人对中国人所谓“消极”性格的蔑视在这个旨在转变中国态度与舆论的机构战争信息署的工作中完全地表现了出来。尽管美国政策清楚地表明要将中国培养成东亚大国和“国际大家庭中负责任的一员”,决策者们还是要求战争信息署负责“培养中国人理解和认识中国要成为大国所必须达到的标准”。美国相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当地政府的配合与协助,让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即美国要扮演这样的角色:通过与地方合作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故而在 1945 年,美国将工作重点聚集于中国国内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而非提供经济、金融和工业生产援助。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的短期目标是希望通过激发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军事战略来缩短抗日战争所持续的时间,长期方针则意图在政治和经济上改造中国。

在地方层面上,战争信息署的分部负责人是这么描述他们的角色的:增进美国的相关机构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好感”,甚至提高受众们的文化生活水平。在他们看来,中国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显得有些贫乏。^② 确保美国和美国人的意愿得到“充分理解”也是战争信息署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让中国民众知晓关于战争和其他国际事件最新的可靠消息”亦是如此。在重庆,战争信息署分部的职能包括:向中国保证美国的支持、讲述战争故事、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声望和通过宣传手段攻击日本。“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将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讲,

^①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verseas Operations Branch, ‘Guidance for OWI Informational Work in Unoccupied China’, 24 October, 1944, 350/71/14/4, RG208, 350/71/14/4, p. 1.

^② Kunming Branch Office (OWI), ‘The Kunming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文章的翻译见 the Liberty Forum, Kunming), (May, 1945), 350/71/14/4, RG 208, p. 1.

维护美国的声望便显得尤为重要。^① 因此,战争信息署的行动便旨在确保美国的利益在战后中国仍占有突出地位。而战争信息署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它的行动主要是传播信息,而非从事文化或外交事务——这两个领域是美国国务院的权力范围。而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战争信息署有两个最主要的目标:一是提供对美方有利的新闻报道,提升中国的战争士气;二是摧毁日本的士气。

战争信息署在中国的信息传播和情报活动会持续多久并无计划;而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日本占领区的计划却在1945年3月开始成形。在两个月前出台的一个长期政策指令、也是第一个针对中国所制定的政策指令表明,美国的决策者们希望利用战争信息署塑造民意,从而建立日本战败投降后该地区的“稳定和平”局势(见表2)。^② 在这个时期,是中国、而非日本看上去更有可能与美国及联合国开展合作,共同打造“世界安全防御体系”,并建立“国与国间的和平外交关系”——尤其是在远东地区。战争信息署的诞生便是对这一战略的有力补充——在决策者们看来,对中国战士奋勇杀敌事迹的宣扬,是战后中华文明重建的关键阶段,也是对脆弱不堪的政治与经济体系进行改革的第一步。

尽管听上去如救世主般盛气凌人,战争信息署战后的规划和指令还是体现出他们对一些影响受众接受度的因素的担忧。比如,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恐惧,使得战争信息署在描述和宣扬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目标时需要有所收敛——这一点被一再强调。另外,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表现出反共倾向,也不要看上去一副奢靡的物质社会做派。同时,战争信息署的宣传专家们还公开鼓吹称,他们相信在中国进行美式改革是满足美国和中国自身利益的一石二鸟之举。

① ‘The Chungking Outpost’, n. d. ,350/71/16/4, RG 208, p. 1

② ‘Draft Long Range Policy Directive for China’ (3 January, 1945), 350/71/14/4, RG 208, p. 2.

表 2 在长期政策指令的要求下战争信息署计划中的宣传材料应体现的目标与主题^①

目标	主题
增强中国国内的建设	民主进程;经济动员
鼓励中方军队参战并取得战果	全球战争;对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名誉攻击和质疑;激发中方的军事进攻
确保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最大化	中美军事合作;美国的相应政策
在打造世界安全防御系统与建立和平外交关系时赢得中方的最大化合作	在世界大家庭中和谐共处
激发中国去承担作为大国应有的责任	中国的国际责任
鼓励并激发一个现代而进步的中国的发展	现代化

信息与公共关系:大众传媒

尽管战争信息署的规划者们常常煞费苦心要在战争信息署更广泛的职能范围内将心理战(“宣传战”)和信息传播活动加以区分,但他们也承认,这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让这两者紧密联系起来的正是战争信息署为帮助美国在中国获利而对中国民意、情感和观念进行的操纵。作为美国的“公关”活动,新闻材料的传播不仅是要通过“增强沟通”来提升国际关系,还意在接触一个被视为对未来中国政治格局最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学生。^②战争信息署每周印发约 4000 份的《美国文摘》(American Digest),这是一种摘录美国报刊文章的中英双语杂志。照片、缩微期刊和剪报通过公开出版物和图书馆传到了中国读者手中。在战争信息署的重庆分部,电影院维持运转,而旗舰刊物《联合画报》(United Pictorial)一周的销量(25000 份)据说比中国的杂志领头羊《西风》(West Wind)(10000 份)还要多。^③战争信息署维持着三套不同的新闻服务,或翻译为中文或是英文原文。此外

^① RG 208, 350/71/14/4.

^② China, Reports of OWI Activities 1943 - 1945, (22 August, 1944), 350/71/16/4, RG 208, p. 1.

^③ ‘OWI in the Far East’, n. d., 350/71/16/4, RG 208, p. 14.

还有一套图书馆及经销商的网络,传播美国杂志、书籍以及题为诸如“著名军事将领”、“1944 年的世界”和“合众国小史”这样的小册子。新近到达四川西部的美国空军人员能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和接受,战争信息署功不可没,它在重庆的行动也被赞为“卓越的公关活动”。战争信息署还有一些其他战地办事处(有些是临时的),包括在桂林的办事处(随后因日军的推进而关闭),在兰州西北部的办事处以及被严密守卫在福建永安的办事处。

表 3 战争信息署重庆分部发布的 1943 年影片放映观众人数^①

月份	观众人数
1 - 8	467,329
9	120,770
10	169,889
总计	758,088

美国参战后,视听设备源源不断流入重庆国民政府控制区(即“自由中国”),其中包括 16 毫米和 35 毫米放映机、扬声器、胶片和录音磁带。战争信息署的重庆分部代表着信息传播活动中心,它与美国大使馆相邻,每周既发布新闻短片,又负责放映影片(见表 3)。1945 年 3 月期间,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的信息部启动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计划——加大对美国在中国战区的军事行动的报道力度,以满足中国读者。第二个计划由战争信息署的中美两国代表合作展开,旨在通过公路和水路把战争信息署的新闻材料传播到“自由中国”的所有城镇。报告表明,图片展览吸引了大批人群(一天大约有 4,500 位参观者),索要更多战争信息署出版物的信件更是一封接着一封。这一计划最终成功覆盖了包括渝贵公路沿线、长江沿岸和前进机场空军基地附近在内的多个地区。战争信息署在重庆和昆明的新闻部门也报告称为中国各大新闻社准备的文章采纳度有所提升。带着“克里米亚会议声明”(对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的概述,这次会议中蒋介石被排除在外)标题的,或是属于“我们的武装部队”系列的图书和小册子,在学生和兵团里

^① RG 208, 350/71/16/4.

受过教育的青年中受到了热捧。^① 在战争信息署的驻地,图书馆同时也作为印刷材料的分销点。这些书籍非常受欢迎,馆内挤得水泄不通。单论受众数量,战争信息署的这两个计划看上去就已经取得了成功。仅一个月里,战争信息署的图片部门就记录下大约两百万的参观展览人数。^②战争信息署还与中国战时生产局(Chinese War Production Board)合作,在重庆的工厂里投放了“激励人心、富有教育意义的新闻材料”。^③

随着战事在欧洲的终结,从1945年5月开始,对战争信息署在中国的媒介之需求迎来了第二次大幅上升。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的代表们注意到,对关于战后欧洲和美国情况的消息,需求量有所增加。^④重庆分部则报告称,大众对图片展览和图书馆服务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⑤新的办公室刚在西安开张,代表们就与当地政府、军政界领袖、记者、教育界人士和社会组织负责人建立了联系。战争信息署的影片放映、图片展览和印刷材料的传播,沿着陇海铁路遍及汉江河谷。《联合画报》在四川(重庆和成都)及云南(昆明)的发行量与战争信息署负责艺术工作和生产的职员数量,一道有了上升。昆明分部的办事处在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举行免费的晚间影片放映,据称“每天还会放映两部影片”,供当地组织和记者观看。^⑥从1945年5月的两份战争信息署报告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相比前些年的工作

① RG 208, 350/71/14/4,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OWI China Division), Monthly Report (March, 1945), p. 1.

② 一个类似的组织“联合国画报办公室”(United Nations Pictorial Office)在同一个月里举办了多达2,809次幻灯片展览,据报告吸引了超过五十万的观众。

③ Donald M. Nelson to President Roosevelt (20 December, 1944),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Vol. VI), p. 292.

④ RG 208, 350/71/14/4,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China Division, Summary of May Report, (May, 1945), p. 1.

⑤ RG 208, 350/71/14/4, Kunming Branch Office (OWI), ‘The Kunming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of article appearing in the Liberty Forum, Kunming), (May, 1945), p. 1.

⑥ Kunming Branch Office (OWI), ‘The Kunming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of article appearing in the Liberty Forum, Kunming), (May, 1945), 350/71/14/4, RG208, p. 2.

现在的影片放映达到了怎样的规模：

“在这个月里成都的两只放映队走了 265 英里,在 34 个地方放映影片 50 次,总计观看人数约 500,000 人,平均每次观映人数约为 10,000 人。通过联系当地的代理商和剧院经理,他们同意在商业电影院放映 35 毫米的美国新闻片,影片放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以及：

“5 月期间,由 17 卷影片胶卷及 3,715 份拷贝组成的三个放映项目被送往各个放映站。在 12 个省的超过 100 个城市中,有 381 个活跃的放映站。总计发出 69 份展品,还为特殊站点准备了额外的展品。从 125 个站点发来的报告显示,一共进行了 813 次影片放映,用去了 3,548 卷胶卷,观众人数多达 446,628 人(重庆)。”^①

一般来说战争信息署的影片在商业影院中放映,也有一些租借给了学校(包括大学)、工人培训中心和医院。^② 报告显示,关于“史迪威公路”(Stilwell Road)建成通车的短片可能打破了所有的票房纪录。^③

战争信息署发布的影片大部分是由美国新闻集团(United Newsreel Corporation)制作,这是由五个大的美国新闻片公司组成的联合集团,负责监督普通话音轨与影片的同步制作。^④ 然后由负责在华新闻片传播工作的环球影城将中文影片胶卷运到重庆,以开展进一步的传播工作。战争信息署的影片进口和放映是在重庆国民政府的许可下进行的,美国的电影公司已和中国达成“租借协议”,根据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予先生同中美文化关系协会(Chines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秘书长的肖博士(Dr

^① ‘China, Mopix’, ‘China, Filmstrips’ (May, 1945), 250/46/4/1, RG59. 比较结果显示, 1945 年 2 月时, OWI 影片放映的城镇观众平均每天约有 5,000 人。而户外放映的观众人数通常比较多, 因为影片会投影在半透明的双面荧幕上。

^② ‘OWI in the Far East’, n. d., 350/71/16/4, RG208, p. 13

^③ ‘OWI in the Far East’, n. d., 350/71/16/4, RG208, p. 14

^④ Taylor M. Mills, OWI Motion Picture Division, ‘History of the Overseas Motion Picture Bureau’s Early Operations’, n. d., 350/17/16/3, RG208, p. 12.

Shaw)的备忘录,计划“恢复并扩大美国影片在‘自由中国’的传播”。根据协议,美国的电影公司将两部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一些描述美国浴血奋战事迹的影片交给一个由重庆政府指定的中国代理机构进行传播,以换取在中国战后市场的一席之地。盈利将会被转入一个战时信托基金,并由中国政府注入资金使其翻倍,从而帮助“美国影片扩大在‘自由中国’的市场”。^① 影片本身是在美国挑选的,因而从根本上保持了其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流动图片展览队则是战争信息署将其活动扩大到重庆和成都邻近地区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1945年4月期间,战争信息署的中国职员在峨眉山山脚举办了图片展览,吸引了当地群众以及前来朝圣的香客们的兴趣。^② 另外展览的地点还包括乐山公园里的孙中山纪念堂和眉山群众教育中心,现场的海报将史迪威公路描绘成了“中国内陆的生命线”。每次两到三天的展览都能吸引20,000-30,000人前来参观。据报道参观者包括当地居民、度假游客、善男信女、大学生及教职员工、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1945年6月6日的若干天后,战争信息署流动展览队来到了广西西南部和桂林。^③ 甘肃省兰州市也成立了一个分部办事处,不过其在中国西北地区主要从事的是情报采集,而不是信息传播。玻璃橱窗中展示的图片来自战争信息署在纽约和英国的办事处,或是由中国部队和美国第14空军及其通信团在中国本土拍摄而成。^④ 在一个月内,多达20,000张图片被传播到重庆、成都和昆明。就像影片和胶片一样,这些图片也是一部分从国外运来,一部分是当地制造。

战争信息署在中国和洛杉矶的电台运营则是战时宣传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战争信息署利用了4个中国广播站:国际广播电台(XGOY)、在重庆

① 同上, pp. 31-32.

② Office of the Outpost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OWI), transmitted report dated 13 June, 1945, 350/71/14/4, RG208, p. 1.

③ China Division (OWI), Weekly Operational Report (31 May to 6 June 1945), 350/71/14/4, RG208, p. 1. 在报告完成之时,这些队伍仍等着被派往那些省份的“解放区”。

④ ‘OWI in the Far East’, n. d., 350/71/16/4, RG208, p. 13.

的中央广播电台(XGOA)、成都广播电台(XGOG)和昆明广播电台(XPRA)。“自由中国”还有另外14个广播站,不过其中的两个:桂林广播电台(XGOE)和洛阳广播电台(XGOQ)由于日军的军事活动基本上无法使用。重庆的无线电发射器为美国听众和懂英语的中国听众播报“美国一小时”(The American Hour),并重播来自美国诸如“中国报告(Report to China)”这样的节目,以及播报演讲和特殊事件的短波电台节目。^①而对成都和昆明的广播电台,美国的影响力则相对要小一些。在成都,战争信息署的广播员无法制作电台直播节目和可随时重播的“录制节目”,因此束手束脚;而在昆明(处于云南国民政府主席龙云的统治下),广播功率较低,当地政府又对战争信息署使用中文广播节目施加限制,使得战争信息署的计划无法如期实施。尽管出于“广播的文化本质”有额外的时间分给了关于中国文化关系的节目,但总体而言,在电台广播中新闻报道仍然有着压倒性的比例。^②

有一种方法,能规避在中国本土运行电台所面临的物质、技术和政治上的限制,那就是从太平洋地区的其他位点发出广播。太平洋行动海外分部办公室副主任在旧金山设了一个电台进行全天候短波广播工作。这个电台(KGEI),由一批语言学专家负责将在华盛顿和纽约写成的文稿翻译、修改成22种语言的广播稿。^③中文广播节目平均每天有约6.5个小时。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争后迅速建成另外一个电台(KWID),其播报内容中有一些不

^① Harry S. Hudson (OWI, Washington) to John K. Fairbank, 'OWI Radio Operations in China' (10 January, 1945), 350/71/16/4, RG208, p. 2. 1944年11月时,麦克拉克·费希尔(F. McCracken Fisher, OWI重庆分部长官)曾表示希望OWI的电台能同时播报包括中文和英文的节目,但这一计划似乎因美国对重庆和昆明的电台控制不力,外加广播节目总体上的匮乏而流产。

^② Memorandum, 'Brief Progress Record of the China Cultural Relations Program, January - June 1942' (10 July, 1942),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p. 717.

^③ Overseas Branch Pacific Operations Office of Deputy Director draft historical report (1944), 350/71/16/3, RG208, pp. 1 - 5. KGEI电台为通用电气公司所有,它并未像战时的其他大多数美国电台站那样,受到新闻封锁和禁用外文的影响。

是新闻。这些电台 24 小时不间断广播,有越来越多的多语种译员及广播员加入:

与战争信息署两大主要职能相一致,广播节目设置有宣传(心理战)和信息服务两种类型。在中国及解放区的广播以信息服务为主,只有将己方文化向盟国进行描述和阐释才是宣传。对于日本当然是宣传,即便这些广播往往披着新闻信息的外衣。对于被占领的国家而言两者类型兼而有之,目的是鼓励反抗,同时提供被敌人限制传播的新闻信息。^①

1942 年 3 月,位于旧金山的国际广播(KGEI)使用普通话和广东话广播。对于会中文的听众而言,太平洋局的广播稿可以分为五个主要类别:

●以新闻报道、评论或是目击者亲述的形式,关注前线和相关政治发展的节目;

●讲述美国生活;

●由在美华人(美籍华人或中国游客)担纲的广播节目;

●关于欧洲生活方面的探讨;

●关于中国的广播节目;

如同在重庆和华南地区那样,战争信息署的电台活动也伴有对非美方广播的监控和分析。战争信息署的那些办事处,不仅传播新闻信息。美方通过重庆办事处的电码室来传输美国陆军和空军对中国战区的战争公报。

同样设于重庆的新闻监督部(The Press Monitoring Department)监控面覆盖所有中文出版物,以及为美国和联合国组织准备的关于物价、通货膨胀和农业生产状况等敏感话题的公报。这个办事处自己的电台记录下了“来自敌方基地一个月内近 150 万字的新闻材料”。^② 为美国和英国的行动提供情报的监控活动,覆盖了重庆的 14 份日报以及中国其他地区超过 50 份的新闻报纸,收集到的情报送达战争信息署内部超过 200 个部门,以及美国国务院、对外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和战时生产委员

^① ‘OWI in the Far East’, n. d., 350/71/16/4, RG208, p. 1. Description is of operations of OWI Overseas Branch Area III(Far East).

^② ‘The Chungking Outpost’, 350/71/16/4, RG208, p. 3.

会(WPB)。^①

心理战

尽管战争信息署从事信息传播活动,但心理战才是其首要任务。来自旧金山的电台报告描述了日军的惨重伤亡和不利的死亡人数对比(“日军和美军的士兵死亡比例是7:1”)。^② 各大战区关于战争进展的新闻报告描述说轴心国很快就会崩溃。1944年11月,一份关于战争信息署在中国战区任务的报告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目标的:

采用一切手段打击敌军士气,利用一切可能的媒介如传单、报纸、广播对占领区民众施加影响——不要为敌人提供帮助——不要工作,包括打仗或提供食物。^③

正如这份报告所指出的,日军军人不是空投传单行动唯一的针对对象。为生活在日军战线后方的中国人所准备的传单及战争信息署制作的中文版《中国画报》(China Pictorial)被直接空投到石家庄和广州这样的城市。1944年11月,战争信息署已经能够制作出25-30种富有特色的传单和半年25期的《辞世》(Jisei)报——这是专为日军士兵制作的报纸。^④ 宣传政策是由华盛顿“每周协调”(Weekly Coordinator)起草、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制定的,并与其他抗日美军部队的心理战分部共享。战争信息署的所有出版物都由负责中国战区心理战的高级美军军官监控。^⑤

承担心理战工作的主要单位是昆明分部。到1945年1月,中国的电台

① ‘OWI in the Far East’, n. d. ,350/71/16/4, RG208, p. 15.

② 同上, p. 12.

③ ‘Brief Resume of PW Operations in This Theatre’, OWI Psychological Warfare Branch, China Theater (3 November, 1944), in ‘Chungking - Reg - Op - 3PWB - Misc95’, 190/8/27/3 - 4, RG226, p. 1.

④ RG 208, 350/71/16/4, F. McCracken Fisher to George E. Taylor and John K. Fairbank, Inclosure (1 November, 1944), p. 1.

⑤ 在重庆,这项工作主要由均曾担任战区司令(Theater Commander: CBI)的国务院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和谢伟思(John S. Service)负责,同时还需陆军参谋部二部(G-2, 军事情报部门)先遣指挥部额外进行清查。

行动规模,包括对日本盟军的监听及拦截信息的传输已达到一个月约 200 万字的程度。^① 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的代表是詹姆斯·斯图尔特和尼尔·布朗(Neil Brown),他们有一组的编辑、作者和艺术家协助,在心理战委员会的监管下制作传单——这个委员会由史迪威将军的继任者、陆军上将魏德迈将军在昆明成立。这些传单由美军空军部队的飞机空投到华南和印度支那。在整个战争期间空投传单成为美国在华发动心理战的最主要形式。战争信息署第二个、也是秘密的行动地点是在福建永安。根据一份报告,除了监听日军的中波电台外,在此行动的特工人员还从事着信息传播工作,“意图在人口密集的沿岸地区塑造民意,以使美军在沿岸地区登陆时能得到当地民众的配合与协助”。^② 美国陆军和海军曾就与当地民众及军事当局包括省长间的关系频频开展调查,发现其关系“相当亲密”。

至于情报工作,与心理战相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便是收集日文材料,在其中深入挖掘日本帝国军队将士的心理特点。起初费正清为“跨部门国外出版物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Foreign Publications: IDC)工作,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不少官员和重庆的情报部长建立了联络关系,在被召回华盛顿前的这段时间里,是美方在这方面最活跃的人物之一。^③ 在此之后,战争信息署和战略情报局就成为两个最重要的竞相与当地华人联络获得有用材料的美国组织。很多工作,如翻译截获的日军情报、炮制语言通畅的心理战宣传材料及审问被捕的日军战俘等是由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也称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以及战争信息署的特工来完成。其中最著名的日裔特工是美国陆军技术军士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这是一位来自于夏威夷的佐治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原本在旧金山当码头工人,后来被派去中共军队从事抗日心理战活动,并负责被擒日军

① ‘OWI in the Far East’, n. d., 350/71/16/4, RG208, p. 16.

② F. McCracken Fisher to George E. Taylor and John K. Fairbank, Inclosure (1 November, 1944), 350/71/16/4, RG208, p. 6.

③ 参见 Fairbank to IDC for Langer - Kilgour, (20 June, 1943), 350/71/16/4, RG208.

战俘的再教育。^①

早期的回报并不看好。(蒋)中央政府虽然名义上参与了心理战活动,但内部混乱无序、一事无成,派系争斗不断。即便情报部声称已在全中国建立起范围广大的对敌宣传网络,但这样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同战争信息署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② 美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进行自己的心理战行动这一问题所引发的分歧,让两国机构更生嫌隙。^③ 费希尔是这样阐述当时的窘境的,“在高层们解决关乎中美全局关系与合作的政治问题前,任何有权力引导政策的联络机构都严重妨碍我们的行动”。^④ 美国政府也官方回绝了国民党的合作意向,称“作为美国战区司令控制下的一项职能,在中国战区的心理战行动,只得停留在美国主导行动的范畴内。再者,为维持秩序起见,制定政策的必须是由华盛顿派遣的官员”。^⑤

虽然战争信息署和中央政府绝无可能达成合作协议,但战时的中国社会不乏刚刚流离失所、心怀愤懑的群体,为美国扩大在华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在重庆,战争信息署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Japanese Anti - War League)取得了联系,这是由鹿地亘(KajiWataru)领导的一个战俘组织。原

① 参见 Ariyoshi, K. (2000). *From Kona to Yanan: The Political Memoirs of Koji Ariyos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Ariyoshi, K. and Deane, H. (1978). *Koji Ariyoshi: An American GI in Yana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Liu, Y. (1997). *Koji Ariyoshi's Role in the US - 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 太平洋战争之后,有吉幸治先是在民主党远东政策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积极工作,后因怀有拥共之心而受到审查。

②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hongqing), 'Statement Made by Vice - Minister Hsu on (February 16, 1945), Regarding Anti - Enemy Propaganda' (copy), 350/71/16/4, RG226.

③ 为与不同中国军队中的国民党部单独进行合作的政策保持一致,因此无论是国民革命军还是国民党自己,对于他们动用美军飞机空投其宣传材料的要求,美国的先遣指挥总部一般会予以拒绝。见 F. McCracken Fisher to George E. Taylor and John K. Fairbank, Inclosure (1 November, 1944), 350/71/16/4, RG 208, p. 9.

④ 同上。

⑤ 'Report of Committee to Study Chinese Proposal Regarding Psychological Warfare Cooperation', enclosure to letter from F. McCracken Fisher to James Stewart (24 February, 1945), 350/71/16/5, RG208.

为左翼作家的鹿地亘与鲁迅是至交,热切盼望能通过谈判为自己及其他同为战俘的伙伴争来一个更好的待遇——战争信息署出现前,这个同盟曾与英国军队联系,探询能否协助英军在印度和缅甸北部的行动。^①由于一时间未得回应,鹿地亘便转投战争信息署,以日文心理战材料的制作者身份被纳入麾下,^②这也标志着美国心理战的一个充满希望的突破。原先是依靠战略情报局跨部门国外出版物收购委员会代表费正清的不懈努力,但他对“大日本帝国陆军”及其占领区的情报收集却总是遭受阻挠。

除了雇佣鹿地亘,中共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提供的情报、谋策及语言学上的支持同样让战争信息署的心理战行动受益良多。1944年7月,战争信息署的人员同美军观察组(后称迪克西使团)一道去了延安。1946年4月13日迪克西使团更名为“延安观察组”,此后他们一直在那呆到了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前撤出陕北。共军驻地与日军占领区的百姓交通来往频繁,延安也为了解日军占领下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一个宝贵窗口。此外,到1944年,已开始有该地区的访客报告称中共在其解放区内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包括对日军战俘从事军事宣传工作的训练。^③麦克拉肯·费希尔(F. McCracken Fisher)亲自展开调查并证实“日本人民解放联盟”(Japanese People's Emancipation League)——八路军掌控下的日军战俘机构——相比鹿地亘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所能提供的较为有限的帮助是个更好的替代选择。费希尔在报告中热情洋溢地表示,可以利用八路军的方

^① F. McCracken Fisher to George E. Taylor and John K. Fairbank, Inclosure (1 November, 1944), 350/71/16/4, RG208, p. 4.

^② 鹿地亘率领他的反战同盟,于1939年12月28日顺利开展一次前线宣传行动,得到了战争信息署的嘉奖,但此后就一直被限制在后方,为中央政府所做的工作也被形容是“断断续续”。参见 John K. Emmerson, 'Yanan Report #21' (10 November, 1944), 350/73/30/1, RG208, p. 4. 战争信息署的心理战小队还得到了一群被关在利多(Ledo, 译者注:为一印度地名)日军战俘的协助。

^③ 参见 Jin, D. (1944). Yan' anjian wen lu [Report from Yan' an] (Chongqing); Forman, H. (1945). Report from Red China, Whittlesey House, New York; Stein, G. (1945).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New York. Additional descriptions of wartime cultural activity in the CCP base areas appear in Jiefangribao [Liberation Daily], 1942-1945.

法加强美军的心理战行动,而且还能额外收集到关于日军及日本国状况的情报。^① 10月,战争信息署与八路军的合作关系开始得到巩固。战争信息署的特工约翰·埃默森(John K. Emerson)与美国陆军技术军士有吉幸治来到了共军驻地,成为这个组织的前线情报部门。^② 之后,战争信息署的特工便得以获取关于新的日本军事术语及军中俚语的词汇表、被日本当局因“损害士气”而封禁的留声机音乐名单以及战俘对其背景和经历的记述——这些都被战争信息署视为“了解日军士兵深层心理”的关键所在。^③

就像鹿地亘在重庆建立的“反战联盟”(Anti - War League)一样,“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被深深嵌入其政治首脑冈野进(Okano Susumu)的个人领袖气质。原名为野坂参三(Nosaka Sanzō)的他在二战前后都是日本共产党一位富有影响力的领袖。冈野进公开声称是1943年到达延安,但实际上早在1940年3月他就已经来到中国。当时斯大林冻结了与共产国际非俄成员的

① F. McCracken Fisher to OWI, Yenan Report I (attached memorandum dated 16 October, 1944), 350/71/17/7, RG208, p. 1.

② 在记录中共抗战时期心理战活动的广度时,有吉幸治,作为冈野进(Okano Susumu,译者注:原名野坂参三,日本共产党创始人,时任日本共产党及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领导人)与战争信息署机构间最紧密的联系人,在其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有吉幸治曾被拘留于曼扎那集中营(Manzanar Relocation Center,译者注:二战时期美国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十大集中营之一),于1942年12月通过了日语专家测验,加入到美军情报活动中。1943年晚秋,战争信息署从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中征召了一支十人心理战小队,要求他们在萨维奇(译者注:明尼苏达州南部城市)营(Camp Savage,译者注:萨维奇营是一所军事情报语言学校的别称)集合。被任命为队长的有吉幸治是这么回忆这段经历的:“当我们被派去从事心理战任务时,华盛顿有很多日本专家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它的人民难以理解、无法预测、癫颠狂热和背信弃义。甚至还有一些观点极端的专家试图证明,日本人是无法了解的。而我们却觉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心理和行为并非难以理解、无迹可循。所以我们很庆幸没有听信战争信息署的日本专家们的简报。”一开始,还呆在缅甸时,他向史迪威将军的一位国务院顾问宣称,自己已经改进并完善了利用日军战俘进行心理战的方法。1944年6月,在中国国民政府解除对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在重庆行动的禁令后,他被立即派去中国。见 Ariyoshi, *From Kona to Yenan*, pp. 78 - 79, 85, 99.

③ F. McCracken Fisher to George E. Taylor and John K. Fairbank, Inclosure (1 November, 1944), 350/71/16/4, RG208, p. 11.

关系,将他们的代表都驱逐出了莫斯科。^① 不过冈野进并非共产党区域内心理战(对敌工作)的唯一设计师;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人物极有可能是毛泽东的八路军高级将领罗瑞卿政委。^② 但冈野进以及敌工部长李初梨却成为延安时期战争信息署特工埃默森(Emmerson)与有吉幸治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冈野进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宣传委员会”(The Japanese People's Emancipation League Propaganda Committee)通过日军占领区的报纸、对新日军战俘的审问、中方提供的材料及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暨华北日本反战团体大会)上收集到的有关日军被俘士兵的需求,汇编出大量制作传单的有效资源。^③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运作的“日本工人与农民学校”(Japa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School)对被俘日军将士的再教育效果也给埃默森和有吉幸治留下深刻印象。^④ 11月15日,埃默森展开了一项有98个被关在延安的战俘参与的调查,意在衡量他们对这场战争及战后日本的想法。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一小部分战俘对这场战争或是天皇制表示支持,这被埃默森描述为“普通日军士兵的信仰和观念能被系统性教化所改变的一个证明”。^⑤ 鉴于中共对日军战俘改造及心理战方面的成功,有吉幸治建议战争信息署要“了解日军战俘的所思所想,以此评估调整我们

① Yu, *OSS in China*, 42, 288 - 289 (n. 57). 关于1937 - 1939年间对被指控为莫斯科的日本间谍之人的肃清和处决,包括很可能是野坂参三在即将离开时告发的政敌,参见 Kato Tetsuro (2000). 'The Japanese Victims of Stalinist Terror in the USSR',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32:1. 关于野坂参三战时在华活动的早期描述,参见 Jaffe, P. (1945). *New Frontiers in Asia—A Challenge to the West*, A. A. Knopf, New York, pp. 283 - 287。

② 参见 Luo, R. (2006). *Luo Ruiqingjunshiwenzuan* [Selected Documents from Luo Ruiqing],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Beijing. 罗瑞卿为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③ F. McCracken Fisherto OWI, 'Yenan Report 12', prepared by Technical Sergeant Koji Ariyoshi and OWI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telligence Team, dated 7 November, 1944 (9 November, 1944), 350/73/30/1, RG 208, p. 3

④ 埃默森进行调查的时候,延安的这所学校招收了约100名学生。在靠近日军占领区的边界地区,由日军战俘及对敌工作者形成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其他分支,同样组织了起来。参见 John K. Emmerson, 'Yenan Report #21' (10 November, 1944), 350/73/30/1, RG 208, p. 1.

⑤ John K. Emmerson, 'Yenan Report #22', (25 November 1944), 350/73/30/1, RG 208, p. 3.

的宣传内容、诉求和文风,这样我们的信息才能被日军理解并发挥作用”。^①但战争信息署并没能将其教育活动及利用日军战俘这一策略加以推广,不过对于战争信息署各分部及在太平洋各大战区忙碌的美国陆军宣传专家们来说,这些“延安报告”在“如何了解日军士兵的想法”这一问题上的确提出了一些独特见解。另外,冈野进的宣传部门还在驻扎于延安的战争信息署小队的请求下,对其从旧金山和夏威夷发出的电台广播提出了批评意见,而这些意见随后也被传达至华盛顿及其他分部。^②

中共组织起来的日本战俘并非唯一自愿为战争信息署心理战服务的团体。朝鲜临时政府的官员也对制作韩文材料颇感兴趣,但战争信息署却因政治原因迟迟未予接受。^③ 还有其他一些因战争而被迁移到重庆的韩国、法国和越南民众参与到战争信息署的工作中来,或是担任志愿者。战争信息署还依靠在国民政府游击队中的联络人获知北平、天津和山海关等地的状况。^④ 这些情报显示双方的非共产党游击军队都进行心理战和士气动员行动:小册子和盐包是最频繁使用的两种方式。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Political Department, Third Section)关于传单的一份报告指出,重庆力图影响多个不同群体的士气和精神面貌,如占领区的中国民众、在华日军士兵及日本国民、在华朝鲜士兵和民众及印度支那、缅甸和泰国的人民。^⑤ 据杰出科学家、军令部代表、国家军委束星北的说法,“情报部对敌宣传委员会”(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ti - Enemy Pub-

^① Koji Ariyoshi, 'Yenan Report #27,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PW Workers at 8th Route Army Forward Areas' (21 November, 1944), 350/73/30/1, RG208, p. 9.

^② 参见 Yenan Report #65, n. d. (1945), 350/71/17/7 RG 208. 报告的附录题为“日军广播电台调查报告”,还提供了关于日军电台分布及监听方式的信息。

^③ F. McCracken Fisher to George E. Taylor and John K. Fairbank, Inclosure (1 November, 1944), 350/71/16/4, RG208, p. 8.

^④ Theodore Herman (China Division, OWI), Outpost Report, 'Conditions and Life in the Tientsin Area (as of April, 1945)', (11 July, 1945), 350/73/27/01, RG208, p. 1.

^⑤ China Division, OWI, Outpost Report, 'Report on Leaflets Prepared by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Political Dept.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Chungking, 1943, 1944', (6 April, 1945), 350/73/27/01, RG208. 尚不清楚为一个美国机构所准备的这些传单是否得到了广泛的分发。

licity[Propaganda] Commission)“不过是挂个部的牌子而已,目的是获取美国支持”。^①事实上,蒋介石曾指示军令部同政治部和中央广播局(Central Broadcasting Administration)协商共事”,但重启的抗日宣传计划还是没什么进展。^②另外,据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长官麦克拉克·费希尔的说法,国民政府运营的包括昆明的输出功率50千瓦和重庆的两个35千瓦在内的一共23个广播电台站,平均每天的播报时长也才勉强超过8小时。而与之相比,日本控制下的电台站共62个,总发射功率达816.58千瓦,除了东京的150千瓦电台站外,在长春、北平、南京和武汉的100千瓦电台站也都达到了每天18小时的播报时长,宣传、演讲和乐曲源源不断地传播出来(当然,是多语种的广播)。

在国民党政府的指示下开展的对敌宣传工作主要是由日本海归学生,以及那些在1945年被情报部聘用的“日本人、韩国人、福摩萨人”负责撰写宣传材料。^③情报部还宣称,在日军占领区有“不少机构”有能力运营地下接收站、印刷并分发传单、小册子和海报及利用重庆发来的材料制作报纸。情报部运营的广播电台用“日语、韩语、福摩萨语、法语和几种中国方言”播报节目,而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分析敌军新闻和宣传,监控他们的电台广播并整理参考材料。^④国民党对敌研究处的领导李超英和“国家资源委员会”

① ‘Notes of the Conversation with Dr. Hsin P. Soh of the Operations Board(Chun Ling Pu)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Feb. 23 and 24, 1945’, F. McCracken Fisher, Chief, China Division, OWI (24 February, 1945), in ‘China: Fisher Correspondence Secret’, 350/71/16/4, RG208, p. 1

② 1943年5月,蒋介石曾要求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开展一项关于“敌军与被占领土,及情报和材料共享”的重大研究。参见‘Fairbank for IDC for Langer - Kilgour (20 June, 1943), 350/71/16/4, RG208, p. 1. See also Richards, P. (2007). Information Science in Wartime: Pioneer Documentation Activities in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39:5, 301 - 306. IDC指跨部门国外出版物收购委员会, BEW指经济战争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在重庆担任跨部门国外出版物收购委员会代表(及战略情报局成员)的这段时间里,费正清还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后者承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一批华北的文件材料”。

③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py - Statement Made by Vice Minister Hsu on February 16, 1945, Regarding Anti - Enemy Propaganda’, 350/71/16/4, Box 1, RG 208, p. 1.

④ Ibid., p. 2.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的几位委员制定了一个建立对敌材料收集站的计划,但由于资金不足使这一计划变成了空中楼阁。费正清指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脑张治中上将聘用了日本共产党员卢库奇(Rockuchi)作为抗日战争顾问。战争信息署的战地情报官员西奥多·赫尔曼(Theodore Herman)透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参与了1943-1944年间超过100份传单的制作,而这些传单似乎是通过美军飞机进行空投的。^①空投目标包括占领区的中国人、日军士兵和民众、朝鲜士兵和民众以及印度支那、缅甸和泰国的人民,传单被印成了中文、日文、韩文、安南文、缅甸文和泰文等多种文字,根据目标人群的不同,传递的信息也有所改变。签字方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日军士兵反战联盟委员会”([Japanese] Soldiers' Anti-War League Committee)、“日本人民反战同盟”(Japanese Peoples Anti-War League)、“日本人民自由与和平联盟”(Japanese Peoples Freedom and Peace League)、“中国官员和士兵”、“日本人樱井(Sakurai Katsu)”、“日本人雅丽斯(Arishi)”,以及朝鲜独立党。其中有些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则是编造出来的。战略情报局历史学家余茂春(Maochun Yu)这样说:

在国民党政府方面,有一家大型报纸企业由情报机构运营,其唯一目的在于收集情报,散布假消息动摇敌军斗志。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戴笠的军统局也出于情报需要运营报纸和其他媒体。^②

盟国之间的不信任

约翰·K.埃默森、有吉幸治作为迪克西使团的乐观参与者曾经到延安

^① 'Report on Leaflets Prepared by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Political Dept.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Chungking, 1943, 1944', Theodore Herman, Field Intelligence Officer, China Division, OWI (6 April, 1945), in 'OWI Outpost Report China Div. Report #TH C:0.1', Entry 370, 350/73/30/1, Box 375, RG208, 2.

^② Yu, *The Dragon's War*, p. 156. 虽然余的观点同较为悲观的战争信息署报告不太相符,但也有可能是战争信息署的观察员们对国民党散布假消息的规模并没有充分的认识。

旅行,这个使团与中国共产党的短暂交往成为中美关系的分水岭。^①但是到1945年5月底,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在富平已经变得非常紧张,美军在其他地方的前沿基地特别活跃。美国大使赫尔利发表的支持国民党的声明实际上主要是基于相互的不信任。冈野进和李初梨向有吉幸治透露说,大使的声明很可能就是内战的借口。^②那一年早些时候在美国的援助许诺几乎没有付诸实施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官员对于向美国空军及战略情报局人员提供支持表达了保留意见。有吉幸治报告说:“我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年了,但是没有做任何事情帮助八路军(意指武器、供给以及训练等等)”,目前情况已经非常明朗,我们不会帮助共产党。^③虽然共产党与美军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还在继续,但延安的八路军联络处人员拒绝与迪克西使团中对共产主义事业态度冷漠特别是把共产党看成苦力的同行合作。由于美国的承诺,共产党希望能得到美国的供给和培训。但他们却发现他们是在干“脏活累活”:他们在为美国人在华北、华东的行动提供安全支持和帮助,而美国的特工则专注于在延安以外的地方以及前沿地区频繁行动搜集情报。^④一些联络处的人员提出建议,鉴于合作水平之低,迪克西使团应该撤出延安。

但有吉幸治留了下来。带着美国新闻照片的复制品、书籍、期刊、电影

① 参见 Barrett, D. (1970).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anan, 1944*,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erkeley; Hart, J. (1985). *The Making of an Army 'Old China Hand': A Memoir of Colonel David D. Barrett*,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erkeley; Carter, C. (1997). *Mission to Yanan: 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 - 1947*,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Lexington; Deane, H. (2004 [1978]), *Remembering Koji Ariyoshi: An American GI in Yana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② Koji Ariyoshi (US Army Observer Section) to Bill Holland, Jim Steward, and Gus Carlson (22 May, 1945), 350/71/16/4, RG 208, p. 4.

③ 同上, p. 2.

④ Agents conducting the operations included FEA and OWI representatives. Operating individually and as teams, each agent required security protection from Chinese soldiers while in the field.

机和电影,他成为在中国内陆及农村地区的美国宣传员。^①介绍完根据地及其生活方式之后,有吉幸治通过放映美国制作的关于田纳西谷管理局、机械农业、工业生产以及成功的非裔美国人种植园主农民亨利·布朗(Farmer Henry Brown)这样的电影,向来自延安英语学校、日本工农学校、朝鲜独立联盟和其他组织的学生发出邀请。^②带着18集团军的照片,他赶着毛驴去附近的村庄为农民放映这些影片。有吉幸治还做了关于太平洋战争、欧战以及美国人生活的图片展。美国的期刊、照片和电影胶片被送到华北的前沿地区,心怀感激的叶剑英将军表示,只要有新的电影、照片、印刷品及其他材料运进来,战争信息署就会继续得到共产党的信任。^③尽管如此,战争结束后合作迅速降温,1947年4月最后一批美国工作人员撤离。由于迪克西使团的到来,延安的战略情报局无线电操作员力图发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无线通讯联系证据,^④日军投降后,战争信息署立即搜集到情报表明:中共军队无视(蒋)中央政府,继续接收日本投降后交出的武器及军需供自己使用。^⑤

同样,美国与重庆的合作迅速转向相互猜疑与相互指责。将中国和韩国的“代理人”并入美国情报和宣传行动的计划可追溯到战争信息署成立的前身信息协调局的建立。信息协调局也成为之后战略情报局(OSS)的一部分。这个政策借鉴自英国特别行动处(British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在这两个案例中,代理人的选择都忽视了复杂的地方政治,散发出强烈的殖

^① Ariyoshi, *From Kona to Yanan*, p. 113.

^② 参见 Koji Ariyoshi (US Army Observer Section) to Bill Holland, Jim Steward, and Gus Carlson (22 May, 1945), 350/71/16/4, RG208, p. 3.

^③ 参见 F. McCracken Fisher to George E. Taylor and John K. Fairbank, Inclosure (1 November, 1944), 350/71/16/4, RG208, p. 10.

^④ Carter, C. (1992). 'Mission to Yanan: The OSS and the Dixie Mission', in Calhoun, G. *The Secrets War: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in World War II*,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p. 305.

^⑤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 (Harry E. Stevens) to Ambassador in China (Hurlley), (18 August, 1945),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 447.

民主义气味。^① 在普雷斯頓·彼得斯(H. Preston Peters)热情洋溢的关于费希尔为负责人的海外部的工作报告中,彼得斯指出,费希尔特别擅长转移信息部主任王世杰和董显光关于美国在中国心理战计划实质的质询。中国官员对战争信息署的新闻及旧金山广播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批评也很恼火。在国民党眼中,这样的有限合作不足以弥补战争信息署活动对政府权威的损害。1943年8月2日,费希尔通知乔治·泰勒和拉铁摩尔,在美国出现的“两个中国”的文章引起了重庆政府的敌对。^② 结果是撤掉了重庆给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广播电台(XGOY)的自由发稿特权。日本的宣传抓住了美国对重庆方面战争不给力的指控,说这是美国种族优越论的证据。1944年12月,中国信息部长王世杰和副部长董显光拜访战争信息署重庆部的费希尔,说他们对美国发布的新闻、战争信息署的新闻报道以及战争信息署旧金山的广播对大元帅和国民党的直言批评很不安。^③ 王和董还表达了对心理战行动的兴趣,但费希尔拒绝透露任何详细信息。^④ 几个月后费希尔还在搪塞这种指责,即战争信息署的行动包含有刺探盟友、转发他们的活动报告给华盛顿。^⑤ 但从中国的角度很难区分战争信息署与当时另外13个在重庆

① Yu, *OSS in China*, p. 15. Concerning OSS plans for Chinese and Korean ‘agent penetration’ of Japanese – occupied areas, see 190/8/27/3 – 4, RG 226 (File: ‘Chungking – Reg – Op – 3, Yenan, 77).

② Chargé in China (Atche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2 August, 194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 81

③ H. Preston Peters (OWI Outpost Manager, Area III) to Edward Barrett (OWI Overseas Branch), ‘Report on Trip to London, China, and India’ (24 January, 1945), 350/71/16/4, RG 208, p. 5.

④ In general, security related to US psychological warfare activities was handled as if the materials were secret. Plans and policies were kept locked in Fisher’s office, and discussion of these files was usually confined to American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OWI employed a bilingual Chinese staff.

⑤ F. McCracken Fisher (OWI China Division) to George E. Taylor (OWI Area 3, Far East), (5 March, 1945), 350/71/16/4, RG 208, p. 1. In this letter Fisher noted that one reason why the OWI was known as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Service (*Meiguoxinwenchu*) in China was because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s name as the *Zhanshiqingbaochu*, or Wartim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would be likely to arouse additional suspicion. Contemporary scholars in China now render the organization’s name as *Zhanshixinwenju*, though *Meiguoxinwenchu* appears to have remained the more commonly – used designation for the OWI.

活动的情报机构。这个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1945年3月,费希尔建议乔治·泰勒,重庆部的工作除了报告民意,还应扩展至政治军事情报领域。

国民党与美军之间这种不信任的状态大大限制了美军与敌后中国民众的接触能力。根据费希尔的说法,很多中国傀儡部队与国民党有着模糊不清的关系,代表着一方势力,中央政府不愿意将他们让渡给美国盟友。^①所签条约禁止美国在中国安装广播设备,这至少部分保证了中国广播网在中国电报领域的霸权。伴随日本军队从贵州撤退,1945年早期,美军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援助在增加。国民党官员如董显光加强了对战争信息署行动、特别是战争信息署办公室与中国新闻界之间关系的监视。^②战争信息署的中方工作人员中有戴笠秘密警察署成员,以及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审查的角度看,这个组织的忠诚与中国政治紧密相连至为关键。作为回应,费希尔经常引证美国对真理的承诺、中国报纸对战争信息署发行材料的需求以及战争信息署将所有它出版的材料交给中央政府,以此反击对其煽动国民党反对派的指控。^③

实际上,战争信息署通过发行未经审查的新闻资料与中国新闻社保持联系是一种示范案例,即对于美国信息署来说,地方政府的期望只是其通过传播美国新闻、服务美国目标大政策框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但国民党的审查官员仍然保持着对信息传播的严格控制。1944年8月一个月在中国报纸中发布的新闻里,据估算战争信息署制作的新闻出现的数量是十分之一。^④这一时期来自于美国方面的材料显示,来自外部的批评导致国民党政

① F. McCracken Fisher to George E. Taylor and John K. Fairbank, Inclosure (1 November, 1944), 350/71/16/4, RG208, p. 9.

② F. McCracken Fisher to John Vincent (Kunming), Sutton Christian (Chengdu), and Christopher Rand (Yong'an), (5 March, 1945), 350/71/16/5, RG208, p. 1.

③ F. McCracken Fisher to Hollington K. Tong (Nationalist Party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2 March, 1945), 350/71/16/5, RG 208 117 China, Reports of OWI Activities 1943 - 1945 (22 August, 1944), 350/71/16/4, RG 208, p. 2. .

④ China, Reports of OWI Activities 1943 - 1945 (22 August, 1944), 350/71/16/4, RG 208, p. 2.

府政策发生重要变化这个说法是特别值得怀疑的。^①

美军在重庆的公共关系办公室阻碍在占领区投送关于战胜日本的新闻。^② 美国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描述战争信息署的行动“广泛而且费用昂贵”,经常批评战争信息署对其《美国文摘》(American Digest)监管不力,不同意其办公室的文职人员充当美国政府的代表。^③ 同样,尽管国民政府信息部声称他们有一个由13个委员、2个秘书、2个部门主管、2名高级职员、2个编辑组成的庞大反敌宣传局——其中有日本人、朝鲜人、福摩萨人,多数是从日本回来的学生,但战争信息署与重庆信息部合作的努力仍然成效甚微。^④ 虽然地下广播和出版业务由国民党代理人在占领区来做似乎非常适当,但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几乎没有进一步合作的机会。1945年5月的报告显示,多兰上尉(Captain James Dolan)不能确定华北的中国读者是否能收到美国的传单。^⑤ 那些在石家庄和其他城市撒下的传单经常被日本人和当地警察没收。在华南,第十四空军时而会通过自己的官员控制新闻内容、定点定时投放宣传品,从而在战争信息署的行动中占据优势。^⑥ 费希尔承认他几乎不知道实际的投放地点,而战争信息署也不能准确报告传单的实际作用。价格上涨超过了中美货币间汇率的变化,使战争信息署财务预算及其工作受到损害。由于重庆对货物运输重量的限制以及时而出现印刷材料短缺的问题,战争信息署在中国的传播活动纵然不是说是随性的,也是不平衡的。电是另外一个问题,特别是像昆明这样的地区,要么是没有可

①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Foreign Criticism’, n. d. (1944), 350/17/16/4, RG 208.

②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Secretary of State (31 January, 1944),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Vol. VI)*, p. 11.

③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Secretary of State(9 January, 1944),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Vol. VI)*, p. 16.

④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Statement Made by Vice - Minister Hsu on 16 February, 1945, Regarding Anti - Enemy Propaganda’, 190/8/27/3 - 4, RG226, p. 1.

⑤ Koji Ariyoshi(US Army Observer Section)to Bill Holland, Jim Steward, and Gus Carlson (May 1945), 350/71/16/4, RG208, p. 3.

⑥ F. McCracken Fisher to George E. Taylor and John K. Fairbank, Inclosure (1 November, 1944), 350/71/16/4, RG208, p. 1.

靠的发电机,要么是电力供应短缺。最后一点,虽然估计在战争开始时中国有超过 100 万的无线电设备,但是到 1945 年时,重庆只有不到 800 套可用设备。^①

结语:和平、沟通与共产主义幽灵

战争期间,美军构建了一个从欧洲到太平洋地区的庞大信息网。战时重大事件新闻,如德国崩溃、巴黎解放等都曾出现在中国制作传播的宣传材料上。重庆的传单生产设备也供给位于昆明和加尔各答的空军心理战行动使用。新技术的使用,如无线传输照片,使得一个战区制作的文字与图像材料可以几乎同时传输到另一个战区。翻译人员以中文、日文、朝文、法文和越南文工作,制作出多种语言的宣传材料,编辑和政策控制者对内容进行调整以适合特别的地区状况,取得不同的心理效果。虽然战争信息署是美国政府的官方喉舌,但像战略情报局这样的组织则从事“黑色”宣传或散布虚假信息这样的活动,目的是在敌方阵营制造恐慌、混乱甚至恐怖。整个二战期间,战争信息署的评论员都在费尽心思地选择它的“宣传”、“心理战”等使用的术语及方法,以区别于纳粹的宣传。^② 但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则不再否认说他们(如果不是公开的)执行了针对盟国的独立宣传行动,其远东战争信息署的一份草案计划就是一个例证。这份计划呼吁战争信息署与美国军事力量进行更大力度的整合,并扩展其责任,包括:

A. 对远东被占领国家进行长期宣传,旨在保持其最大可能的对日本的抵抗,以巩固、保持甚至扩大其现有存在……B. 对日本平民进行长期宣传……C. 进行“黑色”和“白色”的宣传活动……D. 在非占领区,特别是在有我们驻军的国家,宣传指向巩固本土居民对盟军事业的支持……E. 使我们的海

^① Harry S. Hudson (OWI, Washington) to John K. Fairbank, 'OWI Radio Operations in China' (10 January, 1945), RG 208, 350/71/16/4, p. 9.

^② Barnes, J. (1943). Fighting with Information: OWI Oversea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 1, 35.

外部队维持高昂士气的项目。^①

简言之,敌人和占领区的人民与盟军人民变得特别容易模糊。对后者而言,宣传代替了信息:与政策相关及其战略影响、而非理解是工作目标。如果,按照余茂春的观点,中美关系危机最主要的问题和中国的主权问题相关联,那么战争信息署的政策从设计上看就破坏了中国主权。^②虽然部分地受限于后勤供给短缺及国民党的审查,但是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在中国的美国宣传机构与重庆、延安的中国同行相比还是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自1945年以来,废止日本在上海和华北的宣传活动只是加速了美国新闻、媒体的快速成长及其教育的存在。虽然美国国内的战争信息署在1945年解散,但其国际部则转交给了国务院,其职能由海外美国领事办公室接管。在中国,美国公共关系新闻报道的物理网络由陆军通讯兵团(Army Signal Corps)提供,1946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多次通过交通部、外交部提出网络操作问题,理由是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美方回应说是商业设施利用。美国事实上拒绝了中国的互惠特权。^③ 信息传播的其他方法还包括1947年美国信息署(USIS)的代表将电影送到在战略及商业上特别重要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东、汉口、沈阳、台北的学校、医院和社会组织。^④ 只要有美国领事馆的地方,美国信息署随之进入。^⑤ 美国信息署将电影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与中国民众及特殊群体接触的媒介,放映一场电影就可以吸引2000-10000的观众。天气暖和的时候平均每月观众可以达到90万人。美国信息署的放映员走入中国乡村,在教会学校(YWCA)和酒店宴会上放映美国电影。和战争信息署的前身一样,这些办事处也举办图片展、开办图书馆、监

① 'Draft Outline Plan for General OWI Operations in the Far East', n. d., 350/71/16/4, RG208, pp. 1-2.

② 参见 Yu, OSS in China, p. 145.

③ Minister - Counsellor of Embassy in China (Clark) to Secretary of State, 119. 2/6 - 1749; Telegram, sent 17 June, 1949,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I)*, pp. 1091 - 1092.

④ 'Weekly Report from China, Motion Pictures' (14 November, 1947), 250/46/4/1, RG59.

⑤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Operations in China, Organisation', attachment to letter from Robert H. Berkov to Arthur R. Ringwalt (20 February, 1947), 250/46/4/1, RG59.

视中文媒体要符合华盛顿国务院官员的利益需要。发行报纸和小册子,与广东和上海的中文广播站打交道,确保美国观点继续在政策制定者特别在意的中国学校、自由分子及“第三力量”知识分子圈中传播。受短期成就鼓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共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还这样写道:

美国新闻署和贸易机会可能是保持美国影响的两个主要手段。基于战争信息署在延安和北京总部的经验,国务院的官员相信,共产党的官员会特别需要来自美国的书籍、电影、画册及其他信息资料,尽管他们明显要进行审查。国务院认为,从长远来看,通过所有可能的媒体保持最大限度的信息流通对我们最有利,即便这些信息只能送达共产党的官员和审查官手中。^①

情况并非如此。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虽然抗日战争产生巨大破坏,但它同时也是国际传播的转折点。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主导了信息传播。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360 台无线发送器在 50 多个国家以 40 多种语言在全世界每分钟发送 2000 多个单词”——一位前战争信息署顾问狂热地说。^②此外,它还引领了一个宣传与信息的新时代,1944 年费希尔所称的“政策优势”成为所有国家和政府永久的而非战时的功能。^③这个态度和思路的新趋向渗透于冷战时代的国际组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UNESCO):

本组织法之各签约国政府兹代表其人民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为世界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遍原因,而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为此,本组织法之各签约国秉人皆享有充分与平等受教育机会之信念,秉不受限制地寻求客

①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16 November, 1948),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 VII)*, pp. 573 - 574

② Siepmann, C. (1946). 'Propaganda and In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Yale Law Journal*, 55:5, 1259.

③ F. McCracken Fisher, 'Development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s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the Japanese' (16 October, 1944), 350/71/17/7, RG208, p. 1.

观真理以及自由交流思想与知识之信念,特同意并决心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①

在这个组织法颁布的时候,美国在中国已经建立起其宣传网络5年了,在这5年的时间里,战争信息署整合了整个远东地区的电影、通讯、印刷媒体和广播网。无论是用于心理战还是信息传播,这个网络的结构几乎变成了中国政治与社会景观的一个永久特征。

战后交流的规则,特别是以和平为前提的人民之间的交流,被用来证明建立在宣传之上的全球秩序整体模式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对于这个宣传术语的负面内涵,战后设计师们渴望通过一个不同词汇的替换消除掉的。从美国学者顾问如西普曼(Siepmann)的角度来看,宣传与虚假和控制相连接,如同一条巨龙站在大门口禁止所有人进入未来,而交流会让地球联合起来。^② 西普曼特别反对浪费美国资源、挥霍再获和平的优势。他看到了美国公司应用电信技术解决全球问题如文盲问题的伟大未来,并且担忧如果没有信息,没有美国的国家-私立组织伙伴关系的意识,国际维和组织将会遭到削弱。事实上,国务院文化关系部(State 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已经在《麦克马克法案》(McCormack Act)出台前建立了,这个法案指出已经有其他国家利用了美国国内交流管道实现其目标。^③ 摒弃战时各部门开拓的地缘政治与信息空间,将会创造一个新的欧亚大国崛起的环境真空,这是美国的战后设计师所憎恶的。

①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1946). Quoted in Siepmann, 'Propaganda and In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258.

② Siepmann, 'Propaganda and In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261.

③ 参见 Childs, H. (1943). Public Information and Opin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7:1, 56-68.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
